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 杨 振

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重要一环，也是当前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薄弱环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部署中，将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厘清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主要职能，读懂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逻辑，识别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难题，才能更好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

要素价格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信号

从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要义，是进一步减少对要素价格的行政性干预，完善要素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的制度和规则，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变化，向微观经营主体传递准确的经济信号、提供恰当的行为激励。

要素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素价格为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最基础的市场信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没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市场整体的资源配置也就难以实现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自负盈亏的微观经营主体优化资源配置，主要受两类价格信号影响：一是商品和服务价格信号。若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出价能力下降，生产者可能就面临着是否要继续维持生产的选择。二是要素价格信号。当要素价格低廉时，增加要素投入数量可能就是相对理性的选择。当要素价格持续上涨，生产者就要考虑是否减少特定要素的使用，是否调整要素投入比例，以及是否寻找使用替代要素等问题。

也就是说，处于生产最前端的要素价格，是决定后续产业链各环节资源配置的一个基础信号。由要素价格传递信息，为微观经营主体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激励，正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底层逻辑。商品服务价格的市场化决定了市场能否活跃起来，而要素价格市场化则决定了谁能以什么样的要素配置活跃起来，它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一个基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两次艰难的价格闯关，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但从现实来看，

要素价格还不能如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变化，要素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扭曲。要看到的是，即便要素价格被扭曲，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是仍然存在的，只不过被扭曲的要素价格传递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资源配置信号。中央提出要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这里暗含着的逻辑前提是要素价格要准确。错误的要素价格本身，并不会阻碍要素畅通流动，但无疑阻碍着资源高效配置。

要素市场化配置面临的现实困难及改革逻辑

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政策着眼点就是要尽可能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状态。相较于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更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从改革的逻辑看，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将定价权交还给经营主体，政府的代价是放弃商品定价权，换来的是更多更活跃的经营主体。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样也是限制政府干预价格的权力，但当下政府放弃干预要素价格的代价更大。

如何减少政府放弃干预要素价格的代价，是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当前，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激烈竞争下，开出了不少形式多样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已经成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掣肘。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已明确提出，防止招商引资恶性竞争行为。这表明，地方竞争确实到了需要进一步平衡和协调的状态。在恶性竞争下，一地放弃干预要素价格的代价，是另一地可以用更具优势的要素价格赢得招商引资竞争。这时，对任一地方政府来说，积极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主动减少对要素价格的干预，似乎都不是最优的策略选择，除非其他地方政府也同样减少对要素价格的干预。

要降低政府放弃干预要素价格的代价，顺利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统一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竞争行为。2016年，我国开始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2024年8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已开始施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针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导致竞争不公平的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审查约束的

对象，恰恰是能够出台各类措施影响公平竞争的政策制定机关。落实好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减少政府放弃干预要素价格的代价，让地方政府愿意主动参与要素市场化改革，不仅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也是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的前提。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再完善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都会因为竞争失序而遭到破坏。

要素市场化改革需持续降低制度性成本

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成本的提升将倒逼资源重新高效配置，但也能让一部分新设经营主体承担更高的要素成本。如何推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特别是考虑到这一事实：我国开始实行更加具有普惠性、鼓励公平竞争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而一些国家则重回加大补贴、支持特定行业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解决好这一难题就更加迫切。

从我国坚定不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看，可行的路径是更大幅度地降低市场制度成本，以此来缓解可能会面临的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对经营主体来说，要素成本与制度成本都是需要真实承担的成本。在不增加甚至要降低经营主体综合成本负担的前提下，逐步改变其承担的成本结构，以真实要素成本倒逼经营主体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大幅降低市场制度成本来充分释放市场潜力。通过减少对要素价格的直接干预，让要素价格能够传递出真实信号，为微观经营主体高效配置生产要素提供准确激励。政府政策的着力点，需要从关注要素成本更多转向盯住制度成本，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

以“调放结合”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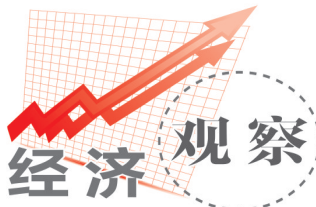
如果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已经矫正，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具体市场制度和规则该如何完善？经济理论表明，市场交易制度和规则的形成与变迁，既有来自顶层设计的理性建构制度，也有来自群众首创的自发演进力量。参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也要因地

制宜，避免“一刀切”。针对不同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有必要采取“调放结合”的思路予以差异化推进。

对劳动、资本、土地等发育相对较早的要素市场，市场交易的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已经基本确立，实践中可采用“以调为主”的改革方式实现突破。如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薄弱环节，主要在于城乡土地权利的体制性差异，必须通过顶层设计优化城乡土地权利制度安排，才能逐步构建起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仅靠土地市场交易主体自发性的制度探索，很多体制机制和基础制度障碍仍然是难以突破的。

对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发育相对较晚的新兴要素市场，市场交易的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尚不健全，实践中可采取“以放为主”的改革方式，赋予经营主体探索形成交易制度和规则的空间，政府要尊重经营主体的首创精神，并及时将行得通的做法上升到制度和规则层面。否则，政府“设计”的制度规则和市场“演化”的制度规则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现象背后的制度根源。事实上，不同领域甚至同一领域的不同企业，要计量和分离不同生产要素的贡献，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因此也就难以“设计”出一套标准的制度规则。

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这里的政策启示是：第一，为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松绑”，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从制度上减少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政策空间。第二，让要素价格真实反映资源稀缺和市场供求，以真实的要素价格信号提供准确激励，更大力度降低市场制度性成本，逐步改变经营主体承担的成本结构，缓解要素价格市场化与释放市场潜力可能存在的难题。第三，针对不同要素差异化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采取“调放结合”的思路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既要合理设计政府主导的“建构制度”，也应充分尊重市场内生的“演化制度”。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完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经济循环的关键一环。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不断升级。在技术驱动、科技赋能和政策指引下，居民消费层次、消费方式、消费形态、消费观念都呈现出新特点，消费需求呈现日益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升级趋势。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新型消费业态代表了消费升级的方向，能够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在畅循环、增动力、惠民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型消费业态是指基于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以新技术为基础，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催生出的新商业模式。新型消费业态与传统消费业态相对应，是以数字化、融合化、绿色化为特色的新型消费，包括线上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智能化消费、个性化消费等。培育新型消费业态，解决消费的供给问题，对扩大内需、更好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消费业态依托技术基础、特色体验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消费产品、消费渠道、消费体验方面展现出更加智慧化、个性化和绿色化的特征。在技术层面，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新型消费业态的产生源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各个消费场景里的广泛应用，技术创新与应用有效促进了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对接，实现消费资源的高效配置。在体验层面，提供一站式和交互式消费体验。一站式消费体现为消费渠道的深度融合，包括线上与线下、业态与场景等方面融合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沉浸式全流程的消费体验。交互式消费体现为消费方式的社交互动，促进消费者与生产者、消费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产品互动，激发更多消费需求。在理念层面，实现经济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体现为新型消费业态的供给能够提升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提高生产与消费匹配度，释放消费潜力、实现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生态可持续，体现为开发打造文化旅游景点、创建生态绿色的体验场景与消费场景，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是现代进程中促进消费升级和内循环顺畅的重要举措。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下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消费业态和场景创新，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方面，消费主体多元化。消费主体逐渐个性化、多元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观念和习惯都深受科技飞速进步的影响，消费时更注重数字化技术、个性化特色、即时满足体验、环保可持续等。同时，线上购物和网络支付的便捷性拓展了老年消费群体，城乡之间日渐缩小的“数字鸿沟”让城乡居民的消费逐步一体化。另一方面，消费场景代际更迭。科技创新和数字化逐步向消费场景赋能，多元化的消费场景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线上消费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5.42万亿元，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超过13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7.6%。消费升级不仅促进更优质、更广泛的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而且提供更多样式、定制化的消费品和服务选择。培育新型消费业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利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为全面促进消费、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推进乡村振兴、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and 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培育新型消费业态，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入手，汇聚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方主体的力量。从需求侧来说，要培育新消费群体，针对年轻人、老年人、母婴等特殊消费主体，有针对性增加产品和服务供给，激发消费欲望、培育消费群体。同时，积极拓展新的消费区域，用好线上购物和电商平台，挖掘农村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潜力。进一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多渠道

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正当其时

□ 代 玉

增加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从供给侧来说，要创新消费场景、创新技术应用、完善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一是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扩大文旅、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培育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增强供给侧对中高端和个性化需求的适配性。例如，通过发展在线文娱的方式，打造数字精品内容创作和新兴数字资源传播平台，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诊疗、药品网络销售等服务，方便老年人就医，为子女帮助长辈就医难的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新型消费业态中的应用。比如，大力发展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新零售业态。进一步加大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一站式消费服务平台，提升消费者消费体验。三是加大对新型消费业态的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新型消费业态企业提供便利。加大财政支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研发创新，推动新型消费业态发展。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新型消费业态的市场地位，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四是优化消费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保障消费者权益，提升消费者信心，为新型消费业态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何为“公募基金”

□ 郭澄澄

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提出“稳步推进公募基金改革”。这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耐心资本、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等政策举措的进一步落实和细化。

所谓“公募基金”，是指面向社会不特定投资者公开发行受益凭证的基金。其内涵特征与私募基金的主要差别在于：一是募集方式和对象的差异。公募基金主要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投资范围不固定、投资者门槛较低，包括社会各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而私募基金通常通过非公开发售方式向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这些投资者门槛相对较高，如具备较高的资产净值或一定投资经验等。二是投资限制不同。相比私募基金，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制更加严格，在投资比例和收费方式上具有更严格的规定。三是信息披露和行业监管差别。公募基金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需要进行全面信息披露，相比之下私募基金保密性更强。此外，因公募基金具有透明度较高、投资者门槛较低等特点，相较私募基金而言，募集范围更加广泛，对散户和中小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更大，具有短期内吸

引大规模社会资本集聚的优势。

公募基金起源于荷兰，在英美迅速发展，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1774年荷兰商人首创了世界上第一只公募基金并广泛投资于商船、种植园、债券等领域，取得了良好上市收益。1997年11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诞生。1998年首批公募基金产品问世。目前，国内公募基金发行总量累计突破1万只，已成为普通投资者财富管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前国内外环境影响下的股市行情波动较大，吸引社会资本集中投向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导向的新兴行业，加快建立中长期投资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对吸引中长期资本入市、培育耐心资本和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尤为重视，在股票市场率先推出了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与北交所上市等改革措施。2024年，为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实体经济与高科技企业、优化金融产品结构，国家在公募基金领域连续出台了两个重磅文件，即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的指导意见》。改革重点是在降低投资门槛、加强风险管理和实现收益增长多目标之间找寻平衡，引导、支持和规范公募基金发展，形成以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重点，以“投资者为本”为理念的全社会参与、全流程监管、多主体受益的价值型投资模式，为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中长期投资、培育耐心资本提供制度保障。

从公募基金行业演变趋势看，未来增长将更多受中长期投资者提升收益的需求驱动。下半年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目标更加明确，围绕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进一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完善配套支持功能，公募基金市场改革需发挥以下作用。

首先，要以服务国家战略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本遵循。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领域，丰富公募基金投资类别，推动投资顾问业务从试点阶段转向大批量、常态化发展，建立与高科技企业并购重组、科技成果转化、资本市场投资结构优化相适配的专业化、标准化公募基金管理和服务体系。

其次，要以让利投资者、回报投资者为内生动力。为持续吸引中长期社会资本入市交易，就需要完善机构

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等配套制度安排，提升公募基金各环节审批效率、降低行业综合费率，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操纵市场的行为，形成中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通过制度配套降低中小投资者成本，促进投融资主体协调发展，形成实体行业收益增长带动投资者回报率上升的长线交易机制。

最后，要以营造中长期投资制度环境为根本保障。通过创新公募基金市场投融资制度设计，进一步发挥公募基金在管理专业化、投资分散化、信息透明化等方面的优势，将公募基金产品打造为价值型投资的重要工具，增加中长期资金和高成长性企业在公募基金市场投融资结构中的占比，构建更加支持权益类投资、更能体现监管包容性的考核机制，形成稳定的社会资本来源。

